

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3

2003

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杨奎松

内容提要 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且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但它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它也与中共方面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且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外的北移路线,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的巧合有关。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换言之,并不存在着美苏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和日本人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国民党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的阴谋的情况。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它在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曾有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关键词 皖南事变 蒋介石 毛泽东 新四军

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颇多风雨,但两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却是1941年初的事。在此之前,两党纵有磨擦冲突,仍属局部问题,而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双方剑拔弩张之程度,离全面破裂以至发生大规模内战,实仅一步之遥。事变最后虽以相互妥协而告收场,但由此而导致的两党感情之对立和实际之分立,已无可

避免地决定了两党关系的最终走向。

皖南事变之发生和平息,原因甚多,而以往的研究似乎过多地强调了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和事变后美国的压力及国际舆论的作用;或侧重于在断定蒋介石国民党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的前提下,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来讨论当时条件下新四军政委项英与中共中央有着怎样不同的态度和策略,以及它们各自对新四军在事变中的损失应当承担怎样的历史责任。事实上,这种讨论的前提本身就存在着某些问题。由于多数大陆学者缺少对这一时期国民党内部关系及其决策过程的深入研究,简单地认定皖南事变乃蒋介石之“蓄谋”,“皖南新四军不管走哪条路线,均避免不了蒋的袭击”^①,因此,自然也就没有注意到蒋介石这时军事解决共产党问题的目的有限,也忽视了苏联方面坚持维持国共关系的态度对中共中央善后政策的影响程度。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把国民党内强硬派的态度与蒋介石的态度混为一谈,或者不注意共产党人在当时条件下政策策略的复杂变化及其原因,似与以往资料尚不充分和研究者过多侧重于对某一方资料之研究有关。鉴于今天大陆中共相关档案、国民党去台前留置南京的相关档案,以及台湾所藏大溪档案和国民党党史会相关档案均已开放,一些亲历者的日记或回忆录业已出版,今人理当可以依据多方资料,以更为客

① 见房列曙《皖南一九四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多数研究皖南事变的大陆学者也持相同看法。如李良明著《项英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即认为蒋不让皖南新四军东去苏南渡江,又故意向日本人泄露新四军有原地北渡消息,迫使项英等决定向南迁回,“正好陷进了国民党顽固派精心布置的陷阱”。即“无论皖南新四军北移走什么路线,都是注定要被围歼的”。见该书第197页。几乎是惟一一篇关于国民党对皖南新四军意图的研究较为深入些的文章,是刘岳化、尤亮的《从国民党文电看皖南事变真相》(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该文利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部分历史档案资料,但文章在资料分析和解读上似带有某些先入为主的成分。

观的态度,对此一事变及其善后问题重加梳理。本文即试从两党关系的角度对此再做探讨,以期使今人对事变发生的复杂性,以及当时之情势与善后之结果的了解,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一些。

蒋介石态度游移

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共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的集中表现,它的酝酿和爆发,标志着两党关系已经走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在国民党方面,皖南事变是其无法容忍共产党力量无限扩大,担心“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相信“共党三年来由三万扩大到五十万,再一两年定不止一百万,那时还有国民党活路”的结果。^①其不惜用军事方法驱除要害地区共产党武装,自然或多或少地会包含着敢于与共产党发生大规模冲突,甚至全面破裂两党关系的某种准备。但是,蒋介石在1940年和1941年是否对此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却颇可置疑。

1940年秋,国共两党关于划界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国民党内以武力清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张开始占据支配地位,不少国民党军政领导人都开始要求蒋介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联名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即所谓皓电),限期1个月,要求黄河以北的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全部按照7月16日“中央提示案”的规定,开赴旧黄河以北。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11月9日发出佳

^① 《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1940年),转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年编印,第325页。

电,只同意将长江以南之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①军令部随即迅速在何应钦、白崇禧示意下拟呈《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

蒋介石批准“中央提示案”与何、白电的基本目的,是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驱赶到旧黄河以北的冀察两省去,限制共产党军事和组织的扩张与发展。作为这个时候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显然无法简单地从国民党一党的角度,或仅仅着眼于局部的军事上的需要,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毕竟,此前国共双方军事上虽有相当多的磨擦与冲突,但大都还只是发生在局部地区,且规模有限,共产党并没有根本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打算用武力解决遍及黄河以南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和浙江几省交界地区异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其意虽不在向中共宣战,然一旦具体实施,难免会让中共认为国民党在发动大规模的剿共战争。不仅中共做出激烈反应会有碍抗战全局,而且在国共日三方力量交错牵制的情况下,此种计划亦未必能够达到目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明确认为这一计划只能以“游击战”来施行^②,且因注意到日汪协定签订在即,为避免被中共指为配合日汪共同反共,对军令部呈文更拖着未签。

然而,久拖不决毕竟不是办法。最后通牒既已发出,政府颜面必须顾及。因此,拖到12月7日,蒋终究不能不做出正式批复,但他仍旧表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惟须“暂缓下令”,“待本月下

① 《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总副司令叶挺军长皓电》(1940年10月19日)、《朱、彭、叶、项复何应钦、白崇禧佳电》,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3—98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979(7),(3)52;《蒋中正致李长官电》(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旬再定实施时间”。之后,何应钦、白崇禧发出齐电重申前令,蒋亦于9日亲下手令,稍事延期,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务必在12月底和明年1月底分别移至黄河以北,而新四军皖南部队则必须在12月底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①

由于这一要求与命令具体规定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北移的时间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第二天就以“现已届十二月中旬,如迟不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为由,再度呈送《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要求批准,同时将皖南新四军也列入了剿灭计划。徐称:“观察江南 N4A 行动,仍不外推托延宕,且现在距十二月卅一日之时期不久,该军是否能遵命北渡长江,尚成问题。此时仍应即时下令第三战区,妥为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届时(十二月卅一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 N4A 立予解决。”^②与此同时,军令部次长刘为章也报送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谈话要点,说明周、叶对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全无具体答复及表示,新四军皖南部队同意开过长江,其用意也在增厚鲁苏方面该军之实力,故“尔后除按既定计划,以武力实际行动以观后果外,口头上之谈判,似无继续必要。”^③ 这些情况都表明,国民党军事高层这时在用军事手段达成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其实远比蒋介石更为急迫也更为强硬,正是他们强烈地催促着蒋早下决心,早做准备。

国民党部分军事领导人急于一战,主要是因为自恃军力雄厚。

① 《蒋委员长令》(1940年12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5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印,第521页;《徐永昌致蒋委员长签呈》(1940年12月1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14页。

② 《徐永昌致蒋委员长签呈》(1940年12月1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14页。

③ 《军令部次长刘斐呈蒋委员长报告与周恩来、叶剑英谈话内容》(1940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5编(四),第234页。

在他们眼中,八路军、新四军不过“裹胁成军”,对前此在河北、晋西和苏北等处与中共军队冲突惨遭败绩心理上极不平衡,必欲报复。在其将中共军队全部限制于冀察地区的要求被拒,新四军江北陈毅部又复与国民党韩德勤部猛烈冲突的情况下,他们想要在军事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威胁的愿望自然更加强烈。何应钦这时就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第三战区应准备“立即将江南 N4A 予以解决”^①。徐永昌则在提出《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之后,更进一步迅速拟就了针对黄河以北八路军的《华北作战计划》,提出应立即在华北地区做好应战部署,必要时亦取攻势作战。胡宗南这时也干脆拟定了进攻中共“首都”延安的作战计划,并密电蒋介石,要求蒋乘正面敌情“甚和缓”之机,“调整战略配置”,增调部队到陕甘,以便“实施直捣肤施之攻势作战”或“应付非常事变”。^②白崇禧则扬言:“此次对于军事已有把握,不至再败”,其甚至力主由第三战区和皖北桂系军对皖南新四军实施南北夹击。^③

基于抗日大局的需要,蒋介石对军事将领的种种要求,坚未松口。他的基本方针是:“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④问题是,手令既下,时限既定,已成骑虎之势。批准了军令部的作战计划,就意味着国民党军必定会对黄河

① 《何应钦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呈蒋委员长》(1940年12月3日)、《徐永昌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呈何总长、蒋委员长》(1940年12月4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10、111页。

② 《胡宗南呈重庆蒋委员长电》(1940年12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89页。

③ 《中央书记处致关贺聂彭等电》(1940年11月1日);《白崇禧电令一七六、一三八、一七二师部署阻击新四军渡江北移等电文》(1940年10月1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05页。

④ 《困勉记》卷63,1940年12月2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以南抗命不遵的中共军队展开行动,届时国共之间难免会出现全面破裂的严重危险。

蒋介石敢于批准军令部的计划,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对苏联政策的估计。因为在他看来,中共的态度受苏联的意志影响甚大。注意到苏联与日本这时关系紧张,对国民政府则态度友善,他相信,即使发生战事,至少“中共当不致扩大叛变”^①。但“不致扩大叛变”的推测毕竟没有十分的把握,为此他不能不尽力限制作战形式和冲突烈度,以便在万一必须驱赶中共军队的情况下避免破裂两党关系。因此,他绝不同意军令部所报《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报陕北作战计划,坚持其他地方必须暂取守势,且希望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时,能把战事局限在“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部队移动范围之内,以便师出有名。

不仅如此,计划批准后,蒋介石的内心也还是有些忐忑不安,担心事情万一闹大。他不能不专门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向周透露了他的强烈担心。他告诉周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他特别暗示周,再不听令怕难免一战,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②。蒋这时左右为难的心态由此不难了解。

《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蒋批准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即于12月下旬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

① 《事略稿本》,1940年12月3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② 《周恩来关于和蒋介石谈话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40年12月2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1—122页。

围,构筑碉堡,准备“彻底肃清”“匪巢”。^①第三十二集团军制定的《进剿匪军计划》规定:“任皖南方面进剿队,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秘密推进至南陵、泾县、茂林村、铜山徐、小河口、水东濯、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扼要构筑工事,确取联系,对匪区严密警戒,随时防止匪军乘隙逃窜,并防其以各个击破之手段集其主力向我反攻,攻击开始后,两翼军协力先进出南陵戴家会、峡山口之线,尔后向北压迫,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②

但实事求是地说,蒋批复军令部的计划已很晚,第三战区和第三十二集团军27日才在徽州开秘密军事会议研究进剿计划,29日负责实施进剿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才最后拟定出《进剿匪军计划》,这之后再发布指令调动部队进入指定位置,要想在12月31日以前完成对皖南新四军的包围,已经不可能了。^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军令部的命令下达过迟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应忽视,即对蒋唯命是从的顾祝同等这时其实也寄希望于皖南新四军能够切实北移,即使稍有延期,条件要高点,也可以商量。

11月底,顾祝同在给蒋的电报中,就详细说明了他力图“切实协助”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这种态度。他不仅同意展期北移,主张如数照发欠发该军的10月、11月经费,建议增加该军北移路线,指定该军临时集结区,而且力主该军秘密潜渡,逐次跃进,乘敌不意,

① 《第三十二集团军进剿匪军计划》(1940年12月29日),《皖南事变》,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

② 《第三十二集团军三十年元月皖南剿匪战役战斗详报》(1941年1月至2月),《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68—169页。

③ 按照计划担任“剿匪左翼军”的第40师12月27日自江苏太湖附近之宜兴溧阳之线交接防务后开始走山路向皖南溪里风、茂林村、铜山徐、小河口、水东濯之线移动,主力至1月2日下午才得以进驻三溪附近。《国民党第四十师方日英部围击皖南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1941年1月4日至15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99—200页。

迅速渡江,免遭损失致影响北移时间等,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他是以安全送走皖南新四军为目的的,并无趁机消灭皖南新四军的意图。^①正因为如此,即使在蒋介石、何应钦明令禁止皖南新四军再走东线前后,顾祝同及其所属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也还是力图协助皖南新四军北移。12月8日,顾祝同即转电称,新四军皖南部队已开始北移,要求“有关部队尽力予以协助,俾顺利迅速转移完毕”^②。11日,上官云相也曾电告皖南行署称:新四军叶挺军长有电报称,新四军军部驻地国民党政工人员到处散布新四军即日将被逐出的谣言,且对新四军士兵家属威胁百出,上官为此明令皖南行署不要干扰皖南新四军北移行动,“密饬所属,俟该军开毕,再行肃清工作,以免其借口”^③。据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的岳星明和时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的武之芬回忆,即使召开了徽州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计划,这一计划的前提也还是建立在新四军抗命不移的情况之下。按照顾祝同的说法,还是“希望他们能遵令渡江”,新四军如果北撤,部署各军则转而负责掩护。^④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明明这时新四军距离蒋所规定的北渡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当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强调实际困难,甚至要求展期时,顾祝同等不仅没有藉机要挟或逼成破裂之局,而且还认真向重庆转达,力请蒋予以通融。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5编(二),第520页。

② 转见《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08页。

③ 《上官云相关于俟新四军开毕再行肃清工作的电文》(1940年12月27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16页。

④ 岳星明:《顾祝同的反共军事阴谋》、武之芬:《上官云相袭击新四军的经过》,《皖南事变资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321—322页。按:本文使用了两种《皖南事变资料选》,二书同名,一为上海版,一为安徽版;在本文中,如未予特别说明,均为上海版。

12月27日,即以部署剿灭皖南新四军为要旨的徽州军事会议召开当日,叶挺、项英向顾祝同说明经费、弹药、冬服等存在极大困难,要求展期北移。对叶项所提各项要求,特别是北渡长江必须“划定皖北庐江县境为职部临时集结境地”,“并请指定庐江六安以北路线,庶可以防止与皖北友军无谓之误会与冲突”的提议^①,顾祝同当时就表示可以商量。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随即再派参谋人员前往新四军军部与叶挺续商。在顾祝同的催促下,江北李品仙亦来电承诺:“黑沙洲至姚沟为该军登陆地点,姚沟至无为以东地区为该军临时集结。由集结地点沿长江北岸东下,经和县南浦口津浦路东。”

12月30日,叶挺又进一步受命要求展期北移。^②对此,清楚地知道蒋有“限期(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解决,勿再宽容”密令^③的顾祝同,仍无坚决反对的表示。相反,在1月3日给蒋介石的电报里,他还在替叶挺说好话。其不仅转电称:“深察叶挺对于北调命令,已有决心奉行。此次与之磋商亦颇具诚意,一再嘱职请求钧座,谅其苦衷,得使江南部队顺利北调。”而且明确提出:“关于经费部分所请廿万元,既包括一月份经费在内,似可照发,弹药拟即先发,步机弹十万发饬分批具领。惟丙项要求展限一月,仍候转请核示。”^④

① 《叶挺项英致渝蒋委员长参谋总长何副参谋总长白电》(1940年12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29030571。

② 《顾祝同致重庆军委会委员长蒋电》(1941年1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30020887。

③ 《蒋介石密令顾祝同“解决”江南新四军反共电文》(1940年12月1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13页。

④ 《顾祝同致重庆军委会委员长蒋电》(1941年1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 30020887。

1941年1月2日,叶挺又来电报提出:决定“先派一个团于虞(七)日经前指定路线进入苏南,转至敌后,分路北渡,余仍待临时费及弹药补给后,再就原地设法北渡,如万不可能时,仍恳准予转经苏南。”顾祝同接电后也还是表示同情。其次日即指示上官云相“飭属知照,予以协助,并密派员侦察该军过境情形及人枪辎重等数目具报”^①。他在5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解释其同意叶挺要求的原因说:“为贯彻前令,防止其以主力由苏南北渡,增援苏北起见,除复飭仍以主力就原地北渡外”,似可允许其先派一团走苏南并补给临时经费及弹药。^②

蒋介石这时的态度也是一样。当他得知叶、项已决定北移,虽然时限已经超过,也还是明显地对皖南新四军的北移抱以某种期望。当然,他不同意顾祝同先发饷弹再走的意见,但他同意,经费和弹药等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且具体指定了新四军军部的北移路线。要叶挺指挥部队在铜陵、繁昌之间渡江后,“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称“沿途已令各军掩护”。^③

由上不难看出,说皖南新四军1月4日南下茂林是蒋介石、顾祝同指定的路线^④,或说蒋、顾有意逼诱新四军南行^⑤,未必是准确的。事实上,当1月4日皖南新四军已经秘密南下之后,无论顾、

① 安徽省档案馆藏档,卷号3·1·88,转见刘岳化、尤亮《从国民党文电看皖南事变真相》,《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② 《顾祝同致渝委员长蒋电》(1941年1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0020894。

③ 《蒋介石指定新四军北移路线江电令》(1941年1月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74页。

④ 见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47—448页。

⑤ 李良明:《项英评传》,第196页。

蒋,都没有意识到会在茂林地区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①他们甚至还曾不同程度上考虑过要不要同意新四军部分走苏南,和要不要适当再度展期的问题。

“一·一七”令之幕后

蒋介石国民党这时态度游移,共产党方面的情况其实也有颇多相似处。皖南新四军直拖到蒋手令所限最后期限,仍不能具体实施北移行动,不得不与中共中央、第三战区以及国民政府军委会多方商量,甚至再三要求展期,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前此种军事磨擦和冲突已经使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充满了疑惧心理。

11月初,中共中央已经做出决定,拒绝国民党“中央提示案”的其他北移要求,惟皖南方面“答应北移”^②,皖南新四军北移已成定局。因此,从11月开始,新四军军部就在认真考虑北移方案问题了。而当时情况下,最理想的方案就是走东线,即向东经苏南然后北渡长江,与江北新四军会合。这一方案最初也征得了第三战区的同意,当月皖南新四军军部就派出北移先遣队1700人,经过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和一〇八师驻地,由苏南实现了北渡。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允许皖南新四军从苏南北渡苏北,并非想要两支新四军合为一股,扩大其在江北的根据地,而是想要新四军军部过长江后,下一步与江北的新四军按照前令,于1月底全部从

① 关于国民党未曾料到会在茂林地区爆发重大军事冲突的情况,也可以从当年参战的国民党第四十师、第七十九师、第五十二师、第一四四师等部队的战斗详报中,以及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岳星明、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武之芬等人的回忆中,了解得很清楚。

②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北移问题致叶挺、项英电》(1940年11月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8页。

苏北向北移过旧黄河河道。此前10月间新四军江北陈毅部对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发动黄桥战役,重创了国民党坚持苏北敌后的主力,已经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高层领导人。只因蒋寄希望于江北新四军仍能遵命限期北上,新四军打的又不是中央军,故他对黄桥战役没有做出强烈反应,且未禁止皖南新四军继续走东线。不意,11月底至12月上旬,由于错估了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批准了江北新四军发起曹甸战役,试图根本消灭苏北韩德勤部。^①战役刚一打响,何应钦就于12月3日提议,皖南新四军不能再走苏南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②。蒋随即也于10日批准了何的提议,并转令顾祝同要叶挺遵命原地北渡或由顾另择路线。因顾并无其他路线可供选择,故只能要求皖南新四军就地于铜陵、繁昌间渡江,经皖北北上。

既然要新四军军部改走北线,即经铜繁间直接北渡,纯粹是曹甸战役的刺激所促成,说其中含有重大阴谋,自然难以成立。^③不过,皖北这时在桂系李品仙部的控制下,李与新四军的关系较为紧张,且沿江又有日军封锁,原地北渡确有相当危险。不允许新四军走东线,而要其走北线,这自然极大地增加了新四军北移的难度。白崇禧在1940年10—11月间确曾有密电给李品仙,李部这期间也确曾做过防堵新四军北渡的军事部署。但必须注意的是,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及第三战区指定的北移路线是走苏南去苏北,而非走铜繁去皖北。桂系军队害

① 毛泽东估计:“苏北动作不碍大局”,认为“顾、韩会要叫几声的”,皖南新四军被问到时“敷衍一下就行了”。至少“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5页。

② 《何应钦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呈蒋委员长》(1940年12月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10页。

③ 李良明:《项英评传》,第193页。

怕新四军军部直接北渡,与其境内新四军合股,造成类似黄桥事件那样强弱易手的严峻局面,因而一度必欲乘新四军“渡江立足未定而击灭之”^①,亦可想而知。问题在于,12月10日蒋下令改变新四军军部的北移路线之后,这种部署即未再出现。根据蒋、顾12日和15日要求第二十一集团军“对匪应暂行停止攻击”,“暂取守势”的命令,李品仙不仅开始通知各师,“飭知新四军开赴河北作战,仰各团政工人员会同当地党部切实宣传毋使潜滋”,而且明令相关各师做出相应部署。^②当然,“暂取守势”,并非不做进剿准备。依据蒋令,李品仙亦于28日,即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徽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的第二天,做出决定称:“如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不遵中央命令,延留滋扰,则进出淮南路以东地区廓清之”^③。

事实上,即使深恐部队遭受围歼的项英,在得到蒋下令改走北线的消息时,虽猜来猜去,也没有怀疑过蒋、顾有所谓“诱歼”的阴

①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749页。刘岳化等的文章以一七六师1940年12月10日作战日记中有乘新四军“渡江立足未定而击灭之”的记载,认定蒋12月10日下令新四军不得走苏南,改走繁昌铜城之间渡江,“全系诱歼之计”,不仅忽略了12月10日蒋批准何应钦和军令部报告送达皖北李品仙部再转达一七六师的时间差,而且将此一作战日记的月份记错一个月,即将11月10日作战日记错记成12月10日。

②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第336—338页。

③ 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第753、756页。有学者以12月24日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副座转发特派员孙福安的一则密电,内中有已通知周团破坏江北新四军在泥汭、姚家沟沿江港汊所架浮桥,并指出新四军声势浩大,恐周团兵力不敷应付,询问可否加派得力部队堵截新四军,“以免势成燎原”的说法,认为是皖北国民党军继续密谋部署要乘皖南新四军渡江立足未稳而消灭之的证明,但此处所引电文不仅与前述李品仙28日准备为皖南新四军让路,待发现其延留滋扰再行出兵廓清之的命令相左,且孙电乃12月10日发出,其时对10日蒋改变新四军北移路线令发出之后皖北国民党军部署改变的情况并不了解,内中说法并不足为第二十一集团军阴谋防堵的证明。见《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08页。

谋,只是怀疑李品仙会否继续过去的防堵部署而不让新四军渡江。他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后,先是担心“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艇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北渡则不能渡,(届时)势将进退两难”。而后则怀疑国民党是否“故意使我不能北渡”,或“使(我)在北渡中遭敌歼灭”?其后则猜测“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他且顾虑由云岭军部驻地到江边,必须穿过日军封锁线,部队“有被截断或遭腰击之危险”。总之都还没有想到会遭遇国民党军诱歼或伏击的可能。^①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皖南新四军北移困难重重,但他开始时也深信蒋、顾不会阻碍。他在给项英的电报中明确讲:“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直到12月中旬以后,他才感到问题严重,开始催促叶、项要迅速北移。到12月下旬毛虽一度想要拿皖南再缓移一个月来要挟国民党,但在得到周恩来26日关于与蒋谈话的通报之后,已不再迟疑,而是严令叶、项迅速北移了。^②不过,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的选择也并非就是项英独断专行的结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是起了相当作用的。

① 转见房列曙《皖南一九四一》,第108页。并见《皖南事变》,第74—75页;《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97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的部署给叶挺、项英的指示》(1940年12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新四军立即分批移动致叶挺、项英电》(1940年12月24日)、《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的通报》(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给项英等的指示》(1940年12月2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9、115、116—117、120页。

到1940年12月底,新四军领导人中对北移路线仍有争论。实际上叶挺就仍然认为部队分别走铜繁和苏南北渡更稳妥,因为只要能够争取到顾祝同同意部分队伍,如一个团经苏南北渡,万一铜繁北渡遭遇日军拦截,即可名正言顺地要求分批走苏南。这也是叶挺1月2日还在致电顾祝同,商量分地北渡,并强调原地北渡“万不可能时,仍恳准予转经苏南”的一个原因。^①

正因为存在争论,中共中央本身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确定的意见。毛泽东在12月27日的电报中就肯定过直接北渡的方案,只是强调叶、项在渡江时“仍须对桂军戒备,以防袭击”^②。故28日新四军军分会开会时,仍旧做出了基本依照蒋令走北线,即大部队直接渡江去皖东北的决定。对此,毛泽东在次日的复电中更是表示同意。电称:“(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即叶挺——引者注)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指示。”^③然而,重庆的周恩来对此颇感担忧,认为“分地北渡有危险性”,寄希望于蒋桂皖北让路,恐做不到,因据情报“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故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显然认可了周恩来的意见,并于30日再电叶、项要其考虑。鉴于这种情况,也考虑到蒋介石和顾祝同有明令禁止直接走苏南,重新申请时间上也来不及,项英等最终遂决定改走南线,即经茂林绕道三溪,转至天目山脚下,避开堵在东去苏南路线上的国民党五十二师和一〇八师驻地,向

-
- ① 注意到事变发生后叶挺曾明确讲过他对北移路线的选择有不同意见,此电或可反映出叶挺行动前对选择北移路线的倾向性意见。
- ② 《毛泽东、朱德关于新四军渡江仍应戒备致叶挺等电》(1940年12月27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3—124页。
- ③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同意新四军由皖东分批渡江致叶挺、项英电》(1940年12月29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4页。